

前 言

政协宜黄县第一届委员会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诞生，同年五月即建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两年来，承县有关方面领导和各界人士的关心、爱护和支持，编印出《宜黄文史资料》第一辑，现捧献给大家，供研究参考。

文史资料工作，是惠及后世，促进四化的一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组成部分，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已故总理周恩来同志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倡导要把文史资料工作搞好。他号召各界人士，抓紧时间“抢救”史料，“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世”，以利于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服务。

周恩来同志生前还谆谆告诫我们，做文史资料研究工作，“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因此，我们做文史资料工作必须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存真求实的观点，把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作为主要宗旨。在处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做到不夸大、不缩小、不溢美、不贬损、不掩饰、不杜撰，忠于历史，秉笔直书。

文史资料征集范围，主要是从戊戌变法以来的人文历史资料。凡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地方沿革，机构变化、军事战争、外事活动、人事更迭、施政情况、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医卫科技、民族宗教、华侨胞情、名师名家、人物佚事、

名人传记、圣地风物、社团帮会，乃至天灾人祸、娼赌烟毒等方面的资料，都在征集之列。

我县始建于吴，定建于宋，历史悠久，贤能辈出。特别值得自豪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宜黄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一九三三年，工农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指挥下，于县境黄陂、东陂等地，先后消灭了国民党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和十一师，获得了我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黄陂战役和草鞋岗战役的伟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谱写了光荣的革命的壮丽篇章。当年，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的业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们的精神风范长存，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宜黄文史资料》第一辑是我县文史资料园地里万花丛中最先开放的花朵，美中不足，在所难免。然而，《宜黄文史资料》是我县政协委员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同耕耘的园地，我们有信心培育好每一朵鲜花！我们热切期望熟悉宜黄文化和历史的同志，深入社会实际，广泛调查研究，挥笔写出一篇篇爱国主义的乡土教材来。盼望各界惠稿，让我县文史资料光彩照人，荫庇后代！

《宜黄文史资料》承蒙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吴允中题写书名，表达了他对故乡人民的深情厚意，谨此致谢！

政协宜黄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6年5月

宜黄县历史沿革

吴希凌

宜黄县始建于吴，定建于宋。历史悠久，疆域属郡更迭频繁，县治时置时废。据有关史籍记载，其沿革大致是：

夏、商（约公元前21—公元前11世纪）时全国分九州，宜黄属扬州（治所历阳，今安徽和县）之域。西周尧商后，封仲雍为吴子，从武王三十三年至春秋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1118—公元前476年）属吴地。战国初元王五年（公元前471年）属越。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后属楚。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宜黄属九江郡（治所设淮南，今安徽寿阳县）。楚汉之际，项羽封黥布为九江王，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改封为淮南王，仍设九江郡（辖十八县），立南城县，宜黄地属南城。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封刘濞为吴王，豫章郡属吴，辖南城，宜黄属之。王莽新朝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豫章为九江郡，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仍改为豫章郡，宜黄属南城县不变。永元八年（公元96年）分南城西北境设临汝县，宜黄属临汝县。

三国魏、蜀、吴鼎立，江西属吴地。吴主孙亮于太平二年（公元257年）置临川郡（治所临川），立宜黄县于宜、黄二水汇合之侧，并以水名为县名，称宜黄，建县自此

始。

晋惠帝时，以扬州（越地）七郡、荆州七郡并置江州，梁敬帝太平二年（公元557年）改江州为高州，均辖临川郡，宜黄属之。陈武帝（公元557——559年）在位时，曾封陈慧纪为宜黄县开国侯，但并未到任，另设相管理。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郡扩州，改高州为江州，临川为抚州，废临川郡为临川县，废巴山县为崇仁县，并宜黄入崇仁县。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抚州为临川郡，宜黄属崇仁县隶临川郡。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又改临川为抚州，析崇仁复置宜黄县，至武德8年（公元625年）又废，入崇仁。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全国分十道，抚州隶江南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改分十五道，江南道分东、西二道，抚州隶江南西道；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抚州为临川郡，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改临川郡为抚州。五代吴顺义元年（公元921年）升抚州为昭武军节度，至南唐保大元年（公元943年）仍改抚州。自唐武德八年至宋乾德四年（公元625——966年）间三百四十二年宜黄未置县，地属崇仁。

北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南唐李煜割崇仁县的崇贤、仙桂、待贤三乡置宜黄场（场所设附东百花州）。开宝元年（公元968年）邑人胥士隆以“赴县遥阻，民甚苦之”为由，请于南唐后主创县便民，后主允其所请，遂升场为县（一说开宝三年即公元970年始准所请），并派陈山童为监县。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南唐土地入宋，陈山童遂受宋命为知县，乃历史上我县第一任县令。县治由水东迁水西黄填镇，即今凤冈镇。属江南西道抚州。自此历经辽、金、

明、清迄今不变。

南宋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抚州始称府，元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江南西道改称江西行中书省，抚州府为抚州路。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仍改称抚州府，宜黄均属之。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废中书省，始称江西省，民国三年（1914年）废府，全省划四道，宜黄属豫章道。民国十五年（1926年）废道，各县直辖于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全省分八个行政督察区，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增为九个行政督察区，宜黄均属第七行政区（专署初设抚州，后迁南城）。

一九四九年五月宜黄解放，属江西省抚州专区（专署设抚州）。一九六七年专区改地区，宜黄属江西省抚州地区迄今不变。

可爱的宜黄

应胜发 娄新阶

宜黄历史悠久。据《县志》记载，宜黄夏、商属扬州。春秋战国属吴、越、楚。秦属九江郡。西汉属南城县。东汉属临汝县。三国魏、蜀、吴鼎立，江西属吴地。吴主孙亮于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分豫章之东部，置临川郡（治所临川），立宜黄县于宜水、黄水汇合之侧，以水名为县名，称宜黄县。宜黄建县自此始，迄今一千七百二十九年。隋开皇九年之后，县治时置时废。至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李煜割崇仁县的崇贤、仙桂、待贤三乡置宜黄场（场所设附东百花洲）。开保元年（公元968年）升场为县，并派陈山童为监县，仍属抚州。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南唐土地入宋，陈山童遂受宋命为知县，乃历史上宜黄县第一任县令。县治由水东迁水西黄填镇，即今凤冈镇。属江南西道抚州。自此建县后历经辽、金、元、明、清至今未变。

宜黄物产丰富。县境处于武夷山脉与雩都山脉向抚河平原过渡地带。东西宽约四十公里，南北长约八十五公里，总面积为一千九百四十二平方公里。总人口一十七万五千，其中农业人口一十五万一千。山青水秀的宜黄，具有四大优势：第一大优势，有肥沃的良田。全县可耕地面积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七亩。人平均耕地面积超过全省的水平。农

作物以种植水稻为主，盛产大米。一九八五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二亿七千三百万斤，商品粮达一亿四千多万斤。此外还种植红薯、棉花、苧麻、花生、油菜、茶叶、甘蔗、瓜果、大豆等。在历史上，宜黄盛产苧麻织成的夏布，驰名中外，远销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第二大优势，有大面积的山林。全县有山林面积二百二十六万三千余亩，人平十五亩。宜黄是全省林业重点县之一。木材活立木蓄积量四百一十万平方米。竹林一十九万八千五百亩，毛竹蓄积量达二千一百万根。油茶林六万余亩。解放三十多年来，营造用材林三十多万亩。林产品以杉木、松杂木、毛竹为主；林副产品有松香、松节油、松油醇、山苍子、猕猴桃、桐油、茶油、乌柏油、板栗、香菇、山耳、冬笋、笋干、土纸、淀粉、魔芋、药材、橡子、柑桔、棕片、桃、梨、枣等三十多种。在山林中还有华南虎、黑鹿、苏门羚、山鸡、蟒蛇等珍贵动物，因此，林业生产是我县一大经济支柱。第三大优势，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宜黄河是县内主要河流，并向北流经往临川注入抚河，自出境处以上流域面积为一千九百四十二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宜水、黄水、曹水、梨水、蓝水五条及次要支流五十八条。年平均产水量为三十三亿八千九百立方米，年平均径流量二十亿零二千七百立方米。全县水能蕴藏量一十一万七千八百瓩，小水电可开发量有四万六千七百瓩。解放三十多年来，全县除大力兴修水利，确保农田灌溉外，还兴建中小水电站一百八十七座，装机容量八千四百二十九瓩。全县十六个乡镇，百分之九十二的行政村，百分之九十的村民小组，百分之八十五的家庭用上了电，真是明珠炯炫，普照宜黄大地。一九八四年，中央水利电力部定宜黄为全国一百个

电气化试点县之一，宜黄人民决心为早日实现电气化而奋斗。一九八四年开工兴建的荐源桥电站，装机一千瓩，一九八六年可竣工发电，同时，装机四千八百瓩的观音山电站，正在勘测设计。过去视为猛兽的山洪将被驯服为宜黄人民造福。大力发展电力事业，将为发展宜黄经济带来活力，增添财富。第四大优势，有大量的地下资源。全县已发现的地下资源有钨、铁、铜、铋、铝、铅、锌、金、水晶、石墨、铌钽、石灰石等。钨于一九五七年开采至今，石灰石已开发利用；其它地下资源有待进一步勘探、开发。

宜黄名人众多，唐代曹山寺本寂禅师，是我国佛教曹洞宗创始人之一。该宗于十三世纪中叶，东传日本，现日本有曹洞宗弟子五百多万人。宋代有著名地理学家乐史（今黄陂乡霍源村人），手书《太平寰宇记》等名著传世。宋代工部侍郎侯叔献（今新丰乡侯坊村人），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修通白沟渠，治理太湖水，同时，造淤田四十万顷，在我国水利史上，扬名千古。明朝有中书舍人，通政大夫吴餘庆（今棠阴镇人），曾协修《永乐大典》和《圣历大全》等名著。明朝抗倭名将谭纶（今潭坊乡人），官至兵部尚书，与戚继光共事齐名，世号“谭戚”，奋力抗倭，名垂千古。清朝有黄爵滋（今凤冈镇人），与林则徐一道，力主禁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志士。现在，宜黄的名人遍及全国各地，据我们所知有铁道机械工程专家程孝刚（今凤冈镇人），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为我国铁道建设和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有物理学家余瑞璜（今二都乡人），现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吉林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部委员，他年高八旬，仍著书

立说，学问精深。还有少将洪涛（今柴阴镇鹿源村人），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吴允中（今风冈镇人），以及江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郑光荣（今梨溪乡郑家村人），广州海军医院主任医师余潜九（今梨溪乡人）等都是宜黄儿女中的佼佼者。更为可喜的是残废青年李德旺虽然是河南省罗山县人，但他把宜黄当作第二故乡，由于他勤奋学习，于一九八五年十月在哥伦比亚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残疾人职业技术锦标赛中夺得银牌，为国争光，成为宜黄的新闻人物。

宜黄素有“戏乡”之称。明代中叶盛行弋阳、乐平、青阳诸腔。嘉靖年间，谭纶从浙江带回海盐腔，经当地艺人演唱而迭变为宜黄腔。至万历年间，宜伶竟达千人之多，故又有“宜黄戏子”之称。汤显祖专为宜伶编演“临川四梦”，协宜黄艺伶创建戏神清源庙，并为之撰写《庙记》。清初昆曲盛行，与宜黄腔结合，创立新的板腔体宜黄腔。“叙伦”、“集秀”两部名传京师，故宜黄腔是京剧“二黄腔”的“鼻祖”。

宜黄还有许多名胜古迹。主要有三更可观日出的壮美秀丽的军峰山；有抗倭名将谭纶墓，墓地的石人石马及石狮石羊基本保持完好；有修葺一新的本寂禅师墓塔；有仙洞，相传北宋王安石曾在此读书，至今“读书堂”字迹犹存；有全省重点开放的石门古寺；此外，桃华山寺的云海，石碧寺的天然石拱和“十八罗汉伴观音”等景致也常常使人留连忘返。县城的十景，如“风冈耸汉”、“狮石回澜”、“斧泉夜月”、“桃洞舒霞”、“卓望朝曦”、“梅峰积雪”、“贯虹渔唱”、“二水环城”均历历在目，只是由于历史的变迁，卷雪亭和百花塔已毁，故卷雪樵歌”、“百花涌塔”。

二景雪消。但是，新建的“龙凤阁”和“望卓亭”屹立在宜黄河畔，亭阁争辉，绿水相映，恰是宜黄新景，川流不息的游客，到此都无不心旷神怡。

宜黄县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和传统。一九二六年中国共产党在我县建立了基层组织。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宜黄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在吴村（今属白竹乡）召开了苏维埃代表会议，成立了宜黄县苏维埃政府，先后在全县建立了五十九个区、乡苏维埃政权，有二千余人参加了游击队和红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豪绅“返乡团”进行浴血奋战。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宜黄是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主战区，先后在黄陂的蛟湖、霍源和东陂的黄柏岭、草鞋岗消灭了国民党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十一师，活捉敌师长李明、陈时骥。史称黄陂战役（或黄陂大捷），东陂战役（或黄柏岭、草鞋岗大捷）。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宜黄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宜黄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各次战争中牺牲了数千人。据吴允中同志回忆，当时，宜黄有一千六百多人北上抗日，到全国解放后只幸存吴允中、洪涛、郑佑仁（已故）等三人。红军北上后，被国民党及“返乡团”杀害的不下一千人。宜黄是鲜血染红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光荣的革命传统将代代相传。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宜黄的山更青，水更秀，人更奋。在中共宜黄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宜黄的两个文明建设成果喜人。一九八五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一亿

一千五百零五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达七千六百五十五万元；工业总产值达三千八百五十万元。农民人平收入达三百九十八元。因此，一九八五年全县的经济形势是解放三十多年来最好的一年。各行各业奋进，城乡市场繁荣，百业振兴，蒸蒸日上，宜黄容貌更美，宜黄人民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党风、民风也越来越好，精神文明之花开遍了宜黄城乡，万紫千红，煞是好看。富饶的宜黄，可爱的宜黄，我们为您的容颜倾倒！我们为您的巨变高唱！可以预料，宜黄在改革中将变得更加富裕、更加美丽、更加可爱！

毛泽东同志论第四次反“围剿”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摘自《毛泽东选集》新编横排本203—204页

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六胜仗。

摘自《毛泽东选集》新编横排本205页

朱德同志论东黄陂战役

战役的经过

敌之“进剿”军战略计划如下：

陈诚为中路总指挥，以抚州为中心，指挥三个纵队，共十个师，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向我黎川、建宁、泰宁包围和截击。

他的战略实施：

赵观涛为第三纵队长，指挥五、六、九、七十九师四个师，由金溪出黎川攻我正面，欲抵住我主力红军于建、黎地区。

吴奇伟为第二纵队长，指挥十四、十、九十师三个师，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我黎、建、泰并截击我归路。

罗卓英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由宜黄、乐安出宁都、广昌，堵击我主力红军归路，并深入苏区袭击我后方。

此种新战略计划，是由于我扩大了黎、建、泰新苏区的胜利之结果。敌以为在战略上分进合击我新苏区对其特别有利。

我主力红军由黎川进攻南丰后，敌之战略仍不变。我主力从南丰撤围后，以红十一军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任务是箝制敌之第三纵队，并迷惑其第二纵队，仍将敌向康都方向

吸引，我主力则向广昌、洛口西进，敌仍不明了我行动，其原定战略仍不变。

我们在此时期即以主力西进，迅速击破敌主力之第一纵队三个师，该敌是对我军最危险之一个纵队，故决心向东陂、黄陂前进遭遇该敌。

二月二十七日，我方面军出敌不意，袭击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于登仙桥、摩罗蟑、霍源、黄陂各地点，遂取得将五十二师消灭，将五十九师消灭了四个团，敌两师长被擒的空前的伟大胜利。

这一胜利使敌之中路军的战略即刻改变，将其第二、第三两纵队改为增援宜黄之援队。俟敌到达宜黄时，我方面军获胜撤退，敌遂重订出进攻计划。

新的计划是：

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将分进合击之战略，改为两纵队重迭作中间突破的战略。

罗卓英仍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九三个师为后纵队。

吴奇伟仍为第二纵队长，指挥十四、十、九十师三个师为前纵队。

以七十九师守宜黄，六师守抚州。新的计划实施即由东陂、黄陂经新丰市、甘竹直取广昌。

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之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

我们的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以红十一军箝制和吸引

其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四个师后，即截断敌之退路，歼灭敌之一个师（十一师和九师）。三月二十一日，当敌之前锋进至甘竹，相距九十里不能回援时，我遂在东陂、草鞋山、霹雳山等地将敌之十一师大部消灭，所剩不支，遂将九师消灭小部，五十九师残部亦消灭殆尽。是夜，我主力军退黄陂，敌之先头纵队亦退南丰，两次进攻计划均告失败，获得东陂战役之继续胜利。

选自（《朱德选集》第7—9页）

我军对发展游击战争已特别注意，并已得到很大发展。独五师更有广泛的活动，独四师和宜黄、乐安、永丰独立团及各小游击队，均有相当的活动，破坏敌人交通线、截断敌人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一军北上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更有相当发展。

东陂、黄陂作战的前后，游击队等起的作用很大。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前进时，前后侧方均被游击队包围着，我主力军袭击时，敌人仍误认为小股游击队，造成了主力红军歼敌的成功。

作战时，我游击队等在敌人侧背后参加了战斗，缴获大量俘虏及枪、炮、子弹与自动步枪，他们极高兴；而我主力军则极恐慌。作战后敌人遇着游击队又误认为是主力红军，不敢前进，防守，天天露营，占领阵地，疲劳不堪。此时游击队

选自（《朱德选集》第10页）

东陂、黄陂均为宜黄县苏维埃及独立团所占，敌人已失去了消息，决战区域内均无反动势力为难红军，给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选自（《朱德选集》第10页）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

在我县的两大战役始末

徐禹谟 邱之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要求一致抗日的迫切愿望，顽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九三三年一月初，日寇继续进攻山海关，向热河进犯。蒋介石向日本投降妥协，出卖了东北三省，并在结束对鄂豫皖苏区的大举进攻后，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蒋介石来到南昌坐镇指挥，二月七日组织了南昌行营，二月十二日任命陈诚为赣粤闽边区“进剿”军中路总指挥。陈诚将所属十二个师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和一个预备队，企图合围中央红军。

“围剿”部署后，蒋介石把大批军队调到前线，并组织民团、土匪，派遣侦探深入我苏区进行捣乱，实行经济封锁。这样，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就比以前三次“围剿”的规模更大，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中央苏区和红军在这个时期也有很大发展。到一九三二年底，中央红军约发展到了八万多人，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也发展到了十万多人。但是，在这时期，王明“左”倾路线的冒险主义

政策在中央苏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执行。他们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进一步污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并改变了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毛泽东同志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诬蔑、攻击和排挤，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同时，“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承认敌强我弱、“围剿”和反“围剿”这一客观事实。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中日矛盾上升之际，却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决死斗争”。反对防御路线，强调要“全线出击”，向中心城市发展，提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争取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

在第四次反“围剿”过程中，“左”倾机会主义者的这些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虽然影响了一部分干部，但在中央红军中却遇到了多数指战员的坚决抵制，使这些错误政策没有得到完全贯彻下去。这是因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战略方针和战术思想，在红军中留下深刻的影响。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等同志负责指挥中央红军，坚持了正确的作战方针，摆脱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集中优势兵力，毅然率领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五军团和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以及江西军区的独立第四师、第五师，宜黄的新老独立团共五万多人编为迎击“进剿军”的主力，充分利用苏区和山地的有利条件，运用“声东击西”、“各个击破”、“大兵团伏击”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布阵于我县

南部地区，先后在安槎、桥头、大龙坪、蛟湖、霍源和黄柏岭、草鞋岗等地，同“围剿”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红军连续取得了黄陂战役和东陂战役的伟大胜利，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黄 陂 战 役

黄陂战役，在大龙坪、霍源地区展开的，是我军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战役。

黄陂地处山区，峰峦连绵，森林茂密。大龙坪、霍源分布在相隔一座高山的两边大山沟里，由西南倾向东北，形成狭长地带。在大龙坪这条山沟，东南至蛟湖、安槎，西北延至小龙坪、登仙桥；霍源这条山沟，由东南的均坪延至西南的蛟湖。这两条狭长地带的两侧，高峰连接，长达数十华里。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迎战“进剿”之敌。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一举歼灭蒋介石嫡系之五十二师全部和五十九师大部。这次战役的胜利，对于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起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把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顾客观实际，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强调部队的正规化和所谓正规战，极力主张主动出击，令一方面军打敌军坚守的县城南丰、南城，威胁敌之中心城市抚州、南昌。对此，肩负指挥重任的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开始就持反对和抵制态度。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给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指出：“这次宜黄、乐安战役以后，敌对城防已更坚守，……因此在东岸目前如不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

轻易过河。这须请你们注意。”（《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1页）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同志又电报中央进一步指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并陈述说：“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2页）二月四日，苏区中央局转发了中央要周恩来等同志率领部队攻打南丰城，进而威胁南城、抚州的命令。对此，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在执行中央命令的同时，另以一部分兵力活动于金溪、资溪和宜黄、乐安等地，牵制敌人。并于二月七日电报中央：“我认为攻下南丰最好，但攻下宜黄、乐安，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仍然可乘胜直捣抚州，且更便运转。”（《周恩来选集》上卷64页）当时的中央无视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再提出的正确主张，仍坚持攻占南丰县城的原意。于是，从二月九日开始，红一方面军以一、三、五军团为主，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向南丰守敌围攻。

二月十二日黄昏后，红军围攻南丰县城国民党军，激战整夜。十三日，在“缴获不足一营，损失却过三百”，“师长彭鳌及两团长均阵亡”，“南丰敌……显示其守城待援之决心”，“敌对增援部署约以三路分进”等情况下，红军“改强

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4—65页）其时，国民党的增援部队即是陈诚指挥的中路军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称西路纵队）罗卓英，率领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为右翼；第二纵队吴奇伟，率领第十师、第十四师、第九十师居中；第三纵队（称东路纵队）赵观涛，率领第五师、第六师、第九师、第七十九师为左翼，还有预备队第四十三师和总预备队第四师、第八十三师，妄图对围攻南丰的红军处于“损伤”和“疲劳”不利的形势时进行截击“进剿”。针对敌人的这一部署，红军“集结兵力于南丰城、里塔圩以西地域，背靠苏区，更积极佯攻南丰，引致敌仍依原定路线“进剿”，以便我首先迎击与消灭其右翼。”（《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5页）我军这一新的部署，果然调动了敌军增援南丰，促使他们提前集中和行动。二月十四日，敌军第一纵队的第十一师开至宜黄、棠阴，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则从吉安、吉水向乐安行进。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以免中途改变进击路线，红军总部“以一部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将敌主力第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秘密转制到敌军右翼，集中于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待机。”（《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82注释76）陈诚部队对红军的这一应变部署毫无觉察，反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命令五十二、五十九两师从乐安继续东进，限于二月二十八日到达宜黄集中，其目的是出宁都、广昌，堵截红军归路，并深入苏区袭击红军的后方。敌西路纵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好，战斗力较强，对中央苏区威胁最大。红军决心在运动战中首先把它消灭。

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五十九、五十二两师人马从乐安

太平圩一带出发，分两条路线向宜黄前进（五十九师向板岭、西源方向前进；五十二师向蛟湖、安槎方向前进），逐步逼近红军的集中地，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于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于二月二十六日十时下达命令，以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二十一军为左翼队；第五军团、二十二军为右翼队；第十二军为预备队随右翼队行动；拟于二十七日以遭遇战在东陂、黄陂、河口以西，谷岗、登仙桥、东源岭以东，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各部接到命令后，分头从宁都北部、乐安南部出发速向我县行动。右翼队由东陂至黄陂向西兜击敌人；左翼队由王竹、苦竹坪向北前进，侧击敌人，其中三军团取道王竹、塘头、港南向下庄、安槎、桥头前进；一军团和二十一军又分成左右两纵队取道跃龙坪、水口向蛟湖、大龙坪一带前进。红二十一军从乐安望仙出发，向登仙桥前进，形成大包围内的小包围。

二十七日上午十时许，红军左翼队的右纵队第九师、第七师等先后到达我县黄陂蛟湖的苦嘴坳、杨梅嶸；十一时许，左纵队第十师、第十一师等先后到达乐安路南、坳下。两纵队侦知蛟湖至登仙桥一线当日上午已有敌人通过，遂命令各部就地隐蔽，待机歼敌。敌人在进军途中，只遇到我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的袭扰，误认为附近没有红军的大部队，所以戒备不十分严密。

十三时左右，敌五十二师行军纵队前卫先头到达桥头，本队到达蛟湖，一个团同师部及直属队到达大龙坪附近时，战斗打响了。先是红军左翼队右纵队与敌接触，第七师插入蛟湖与大龙坪之间，佯攻蛟湖之敌，箝制蛟湖之敌向大龙坪增援；第九师和第十师的三十团合围主攻大龙坪之敌，先以机